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猖狂。

当时，早已迁至嵊县石下阳的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距长乐前线很近，敌机不时飞临学校上空——上半年校舍就曾被炸毁过。

过了寒假，锦堂师范春季又招了普师、简师各一班。乡村学校正需要大量的师资前去充实。教育，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希望，无论怎样，师范教育、乡村教育的旗帜都不能倒下。

但是，由于学校地处前线，又不能不做好应付事变准备，也许什么时候突然又有紧急情况，还得第二次内迁。校长郭人全未雨绸缪，收集浙江省及嵊县、东阳、磐安、仙居、缙云、永康等县的地图，对撤退的路线作好初步的设想；后又派几名职员，带了地图，作进一步的实地调查和勘察，决定把白宅墅当作撤退的第一站，以玉山小学为第二站。当时，省内许多学校都迁往缙云壶镇，郭人全也打算以壶镇为迁校目的地。他派人打探了从玉山经天台的方山、磐安的大皿到壶镇的路线，了解到

打开房门进到家里，第一眼就看见沙发上搁着一件蓝布褂，就是那种不起眼的工作服。呆会还有人来访，在沙发上搁这么一件衣服似乎很不搭调。

我手里的包未及放下，就用空着的手将那件衣服从沙发上挪开了。我将衣服拿到餐厅，顺手扔在一把椅子上，才坐下来喝一杯水。

这时我发现地板正泛着洁净的光泽，客厅茶几上散乱的报纸不见了。洗手盆重新拥有了原先的白净，窗子明亮，阳台上晾满了衣服。

我知道母亲来过了。成家后，母亲问我要去了房门钥匙，尽管她没说，我知道她是为了随时过来，帮我们拾掇拾掇。

我的手触到了母亲落下的这件蓝布褂，我将它捧起来，为刚才的想法深深内疚。

母亲有好几件蓝布褂，是她干活时穿的。我的记忆中，还留着十几年前母亲穿着蓝布褂在一个席草制品厂干活的情形。我们放了学去找她，穿过潮湿泥泞，粉尘弥漫的厂区，好不容易在一群蓝布褂中找到母亲。母亲戴着厚厚的口罩，头发、眉毛上全是白色的粉末，像一层凝重的霜雪。她将我和妹妹拉到一个无风的角落，从蓝布褂里掏出两个馒头，或者一片面包。那是工友们干活累了时一道哄着买点心吃，母亲才愿意花一块钱买的。但她又舍不得吃，就用洁净的袋子包起，好在放学后给我们。我还记得母亲落满尘土的手从蓝布褂里摸索出的两个馒头的温热，我和妹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我少年时代对于蓝布褂的记忆。往后，一到干粗活和重活，我就常常看见母亲穿着蓝布褂忙碌的身影。她在房子转角处一条废弃的路上开辟了一块菜地，她穿着蓝布褂，将河岸上疏浚河道留下的泥土，一簸箕一簸箕挑到那个坚硬的转角，她用锄头将这些土块一点一点敲碎，那时，她的蓝布褂就在身上，被汗水润湿了一大片。等到夏日傍晚，她又穿上蓝布褂，用洒水壶给菜畦里的蔬菜洒水，蓝布褂的身影在简易的篱笆里穿来穿去。

我新装修的房子要铺地板了，母亲就蹲在地上，用小刷子一点一点扫，她裹着蓝布褂的身影是那么瘦小，蹲在角落里，让我一时间都会找不到。她将漆匠泥水匠工匠们落下的水泥石灰和木屑一点一点扫起，她慢慢地在一根又一根木档间移动，手里的小刷子一刻也没停过。她的蓝布褂那会儿落满了粉尘，一片深蓝里沾着左一块白，右一块白，让我恍惚忆起十几年前那个席草厂里的母亲。岁末年尾，母亲又开始大扫除了，将一年来沉积的尘埃慢慢擦拭，她努力地踮起脚，站在一张方凳上，她不愿放过窗户最上方的一小片污垢，她总是那么固执，仿佛不将那些污垢去掉，就是她的失职了。母亲那会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2013年12月10日的那个傍晚，老年大学文学社的学友何祺绥老人，骑着一辆“老爷”自行车，第一次到了我家，我一杯清茶招待首次登门的稀客，分别坐在小桌子旁的椅子上，高高兴兴地促膝交谈。他坐定以后，把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登记表交到我的手上，并细细地解释各个栏目填写的内容，说到“介绍人”这个栏目时，他说：“已经和冯瑞祥联系过了，老冯同意做我的介绍人。”然后，老何又微笑着对我说：“第二个介绍人就请你了。”我在老何面前是“小字辈”，真有了受宠若惊的感觉，我欣然同意，他高兴地笑了。当时他还告诉我，宁波日报正在进行“美丽宁波”的征文活动，他已写好一篇稿子，题目是《让港城腾飞》，请儿媳妇打印好以后去应征投稿，耄耋老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非常爱读老何的文章，当即祝愿他的文集赶快问世，让我和学友们早日拜读。那天，我俩聊了许多，告别的时候，我要送他一段，可是老何执意要我留步。我只能站在小巷口，目送着他推着自行车渐渐走远。哪里想到，这就是我见到何祺绥

各处都有祠堂可以借用，才略放宽心。

1942年5月15日，学校接到情报，日军大举进攻浙东，进逼嵊县。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锦堂师范只能二次内迁。凌晨三时，郭人全携老带幼，带着锦堂师范，带着乡村教育的火种，在浙东沦陷之际，悲壮地上路了……

当晚，他们就住在白宅墅。学校的经费是按月拨付的。一旦与省教育厅、财政厅失去联系，师生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郭人全把住在白宅墅的师生员工初步安顿好之后，就带了一个当时流行的警报袋——里面放的是破旧的毛巾和瓷杯，扮作普通的行人上路了。

临走之时，郭人全告诉带队老师，如果长乐也被敌人占领，那么就退到玉山。他领到了经费，马上回来，与大家会合。第二天，郭人全独自一人，下桃树岩岭，经过“八达”到郭宅老家过夜。第三天，雇了一辆独轮车，到后岭山公共汽车站，打算乘车前往，可是买不到票，只能徒步到永康，才买到去丽水的水票。次日一早，搭上汽车，经缙云，终于到了丽水——当时，省教育厅已迁至丽水。第二天，见到了教育厅长

照例穿着她的蓝布褂，蓝布褂在玻璃的那一边移动着。有时，它的下摆会被风吹起，我就看着那一角深蓝缓缓飘动一下，又一下。穿着蓝布褂的母亲那么瘦小，但站在方凳上的母亲却那么高大。

还有多少次，母亲骑着她的旧自行车来我家，她迎着风，总是骑得很慢。母亲特不擅长骑车，我们常常笑她骑车的样子木讷别扭，一遇见前面有电动车，她就使劲打铃，若是汽车突然蹿出来，她必用力捏住车把，紧急刹车，一脚突兀地从车上踏下来。那会一件蓝布褂就静悄悄搁在车篮里，跟随着母亲的自行车，远远赶来。母亲将自行车停在一个现代的小区的楼下，从车篮里拿出抹布和刷子，还有那件蓝色布褂，现在已经不是那么蓝了，在它的蓝里泛着一层洗刷出来的白。我想小区里的人们会不会将母亲认错呢，会不会将她看成了一位钟点工？

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她应该到我家来作客才对；她应该坐在儿子窗明几净的客厅里喝一口茶，看一会电视才好；应该在餐厅里像样地吃一餐饭，喝一口热汤才好。但是从来也没有过，尽管我已成家，但角色仍然未能改变过来。她还是操持的母亲，我还像未经世事的儿子。她每次来都是目的明确的，她担心她的儿子。天冷下来，她一次次打电话来，说被褥要换厚的了，说被子该晒一晒了。有时我推开房门，沙发上放着三双鞋垫，有时是一打干净的袜子。有时，卧室的飘窗上，凌乱的衣服一件一件都折叠齐整了，每一条折痕都那么线条清晰，棱角分明。母亲做这些事情是顶真的，一切都那么有板有眼，就像我面对自己的文字一样。还有时，洗衣台上会多出一个板刷，母亲说这个板刷柔，是用来洗棉质衣服的，母亲洗一件衣服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和时间，再脏的衣服到她那里都会被洗得没有一点污渍。而我们却常常抱怨，说领子破了，袖口折了，我们有时也跟她她说，这个料子不能刷的，这个材质只能轻轻搓。而事实上，母亲做得比我们专业多了，洗我的衣服，她总是小心翼翼，即便一件衬衣，她也觉得是珍贵的。

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不识字，无固定工作，命运多舛。我有时担忧，她的人生会不会因了没有一个固定目标而显得无望呢？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母亲做的一切都是她的事业，洗衣服、扫地、叠被子、扫除尘埃、把窗子擦亮……这都是母亲的事业。我成了她的儿子，我更是她一生的事业。我的幸福，就是她固不可撤的目标。

我站在窗前，凝视着母亲跨上那辆旧自行车，凝视着她穿着蓝布褂的背影在黄昏的暮色里渐渐远去，我的心充盈了一股暖流。

何老》和《老何，走得太匆忙了》发在文学社的网站上，亲切的回忆，深情的悼念，感动了许多学员和网友，以后又有十多个学员和昔日的老同学、老朋友撰写悼文、诗词，字里行间无不赞叹老何对事业、对学习的执着追求，无不为

【“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春蚕到死丝方尽

林美鼎

老何匆忙告别亲人友人而无比沉痛。文学社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同窗共读十余年的好友们获悉此情，热情地伸出友谊之手，和秀玲老人合力，共同承担收集老何遗文、编辑成册的义务，我无形之中成了“联络员和责任编辑”，起到了王秀玲老人和文学社之间的桥梁作用。负责《浪花》编辑工作的

和科长，领到了两个月的款项。一路不敢大意，匆匆往回赶。世道这么不公平，身携巨款，内心甚是忐忑。他第二天就赶回后岭山车站，又步行30多里，回到了郭宅，才稍稍放心。他把款项塞在棉裤心里，又和内衣一起，做成包

【思想散墨】

锦堂师范南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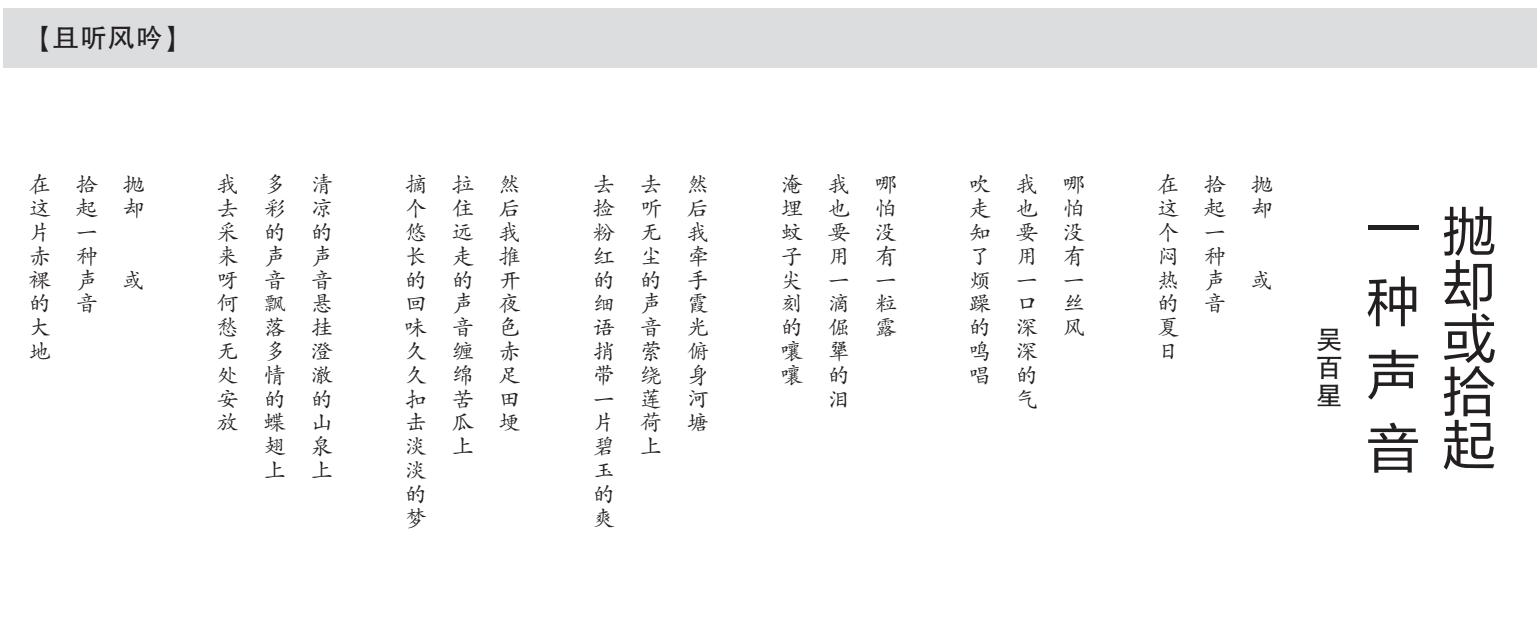
岑燮钧

裹。天亮之后，找上本地信得过的三个农民，一起上路，步行20多里到桃树岩岭脚下。路上碰到不少逃难的学生，是绍兴中学的，他们说：“锦堂师范的学生都逃到玉山了。”

郭人全心急如焚，一口气赶到玉山小学，已是午后一时。师生员工和随行家属，见到了郭人全，都高兴得什么似

的，纷纷涌上来，告诉他最近的事变。原来，他们在白宅墅只住了两夜，听说日寇分两路进军，正向山区搜索，就连忙撤退到此。郭人全见大家都幸获安全，甚感欣慰。可是，他实在太累了，吃了点饭，倒头就睡着了。

郭人全还没睡上一个小时，就有人来报，日寇顺着这个方向索骥而来，接着，远处就传来了枪炮声。郭人全立即通知学生集合，找来向导准备撤离。可是，时已入夜，向导对郭人全说，日军在20里开外的村庄宿夜，不会在夜里进军，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跟着向导，到下一村庄的庙里休息。趁间隙里，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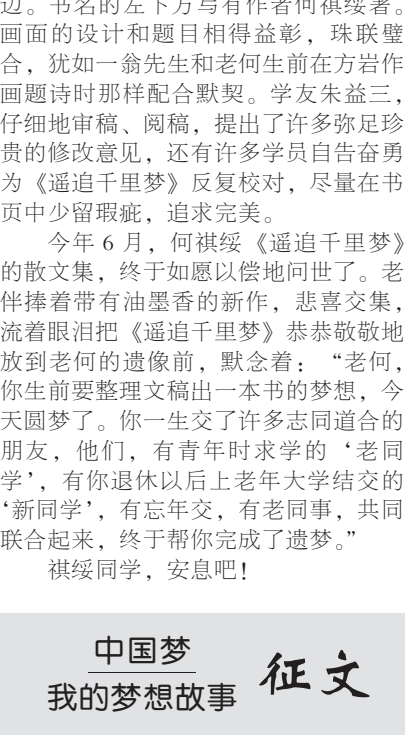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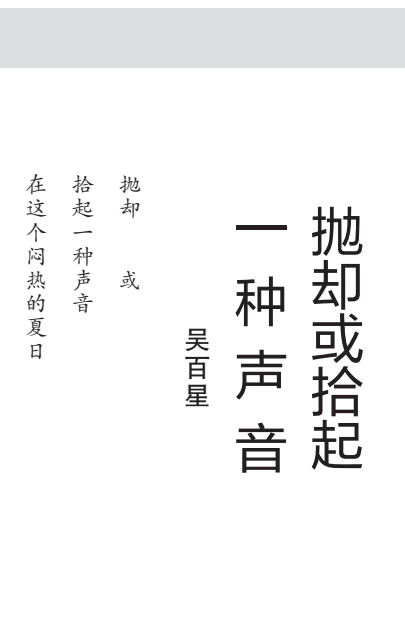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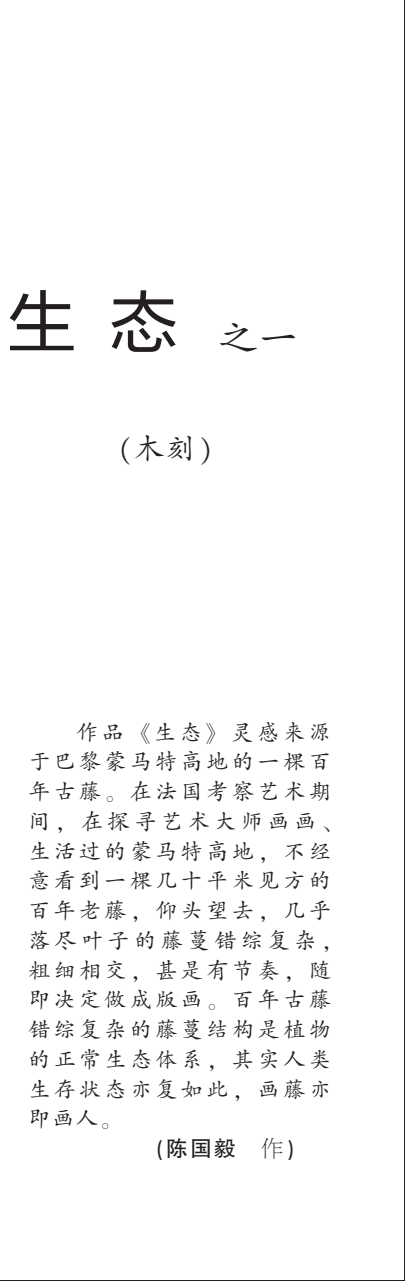


长，走得很散，有的落在后面，有的三五成群地倒在路边小憩，有的脚高一脚低地坚持着，其中约有60几人聚集到一起。大家就在一个小村庄暂时休整，烧了一大锅玉米糊，当了一顿晚饭；剩下的一半作第二天的早餐。天亮之后，吃过热了一下的玉米糊，又向壶镇赶去。快到壶镇时，有人告知，壶镇的学校都解散了，人们白天都躲到山上去，镇上很冷清，简直是一座空城。在一条三岔路口，有一块牌指着：西至棠慈。郭人全脑子一闪，心想：是否可以到那里去暂避一时？一打听，棠慈是个大村落，有祠堂。于是，队伍就转到棠慈，而且在那里还遇到了从壶镇撤退来的浙江医专，医治了几个生病的同学。因为走散的人较多，大家就四处打听消息，到处张贴“锦堂师范在壶镇西边棠慈”的告示。过了几天，走散的学生也都陆续赶到了。

第二学期，学校正式迁至壶镇雅湖贩。至此，锦堂师范在壶镇正式落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她的原籍地慈溪观海卫东山头。在南迁过程中，大家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经受住了战乱的考验。

生态 之一

(木刻)



中国梦想故事 征文